晚明印谱制作的资金来源、定价与营销

孙 志 强

内容摘要：晚明时期的印谱是篆刻艺术与出版文化结合的产物。印谱刊行资金常通过捐资与助刻等方式筹集，各类印谱定价遵循“原钤本高于摹印本，摹印本高于木刻本”的规律。制作方式是决定印谱价格的关键因素，印刷用纸、刻工字体、装潢品质等次要因素也会影响印谱的最终价格。与普通书籍相较，印谱定价相对高昂，消费群体主要是专业印人与上层文人。在印谱发行过程中，谱主会运用多种宣传营销手段扩大销量与影响；面对盗版，则会采取增加版权页、扩大发行量等应对方式以减少损失。印谱刊行深度嵌入晚明商业出版中，关注晚明印谱的商业运作方式，不仅对篆刻史研究大有裨益，更能揭示晚明艺术类书籍的出版规律。

关键词：晚明印谱　资金来源　定价　消费群体　营销策略　版权意识

晚明时期是中国文人篆刻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出版文化空前繁荣的阶段，印谱正是二者交汇与融合的产物。就内容而言，晚明时期的印谱可以分为专门汇辑古玺印的集古类印谱与印人名家自刻类印谱。集古类印谱具有“范本”性质，呈现出高度的商品化倾向；名家自刻类印谱多是篆刻家的“个人作品集”，常用于朋友之间的赠阅以及个人艺术能力的展示，商品化程度较低。就制作方式而言，印谱又可分为原钤本、摹印本、木刻本三种类型。原钤本印谱以玺印原印径直蘸取印泥钤盖而成，摹印本印谱则是以印蜕为底本，先摹刻成印再蘸取印泥钤盖而成。二者虽然都采用钤印的方式成谱，但有本质的差别。木刻本印谱多是依据原钤本或摹印本为底本，采用雕版方式印刷而成。

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是中国古代印谱刊行的首个大流行时期，从隆庆六年（1572）顾从德家族刊行原钤本《集古印谱》开始，至崇祯年间，印谱刊行数量众多，仅《中国古籍总目》就著录了 75 种①，另有 9 种散藏于海内外各公私机构中②。此外，缪荃孙《重编红雨楼题跋》、叶铭《叶氏印谱存目》、王敦化《印谱知见传本书目》，以及明人诗文集、地方志等著述中尚存数十种已佚印谱的记载。作为特殊类型的“书籍”，印谱具有一般古籍的外部形态，在刊刻发行过程中也遵循出版史的一般规律。对明代印谱的考察，对于篆刻艺术发展史研究极具意义。同时，印谱刊刻过程中的资金筹措模式、发行过程中的定价与定价依据、应对盗版的策略等，也为晚明出版史研究提供了艺术类书籍的典型样本，是探讨晚明商业出版的绝佳材料。

一、印谱制作的资金来源

印谱制作是一项耗时耗资的活动，其成功实施离不开持续的人力投入与长期的财力保障。因此，一部印谱的制作需经过周密筹划与充足预算，而制作资金的筹措无疑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尤其是集古类印谱的体量较大，动辄载印一两千方，制作时间通常需要两到三年左右③，谱主个人的财力往往无法支撑印谱制作的支出，此时资金来源便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

①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第 8 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4885—4887 页；《中国古籍总目·子部》第 3 册，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415—1427 页。按，《中国古籍总目》所收明代印谱分属于史部“玺印之属”与子部“篆刻之属”，其中史部收录 26 种，子部收录 49 种（不包括清人辑明人印谱以及成谱于清初的明人印谱，同一种印谱的不同版本计作 1 种）。

②现存世且未经《中国古籍总目》著录的明刊本印谱至少有以下 9 种：1. 万历三十七年（1609）鲍钊《印薮搜奇》（香港松荫轩藏）；2. 万历四十三年（1615）陆仪《五合曲印谱》（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索书号：善 2551）；3. 万历四十七年（1619）何涛《何萨奴印略》（香港松荫轩藏）；4. 万历间资旭旸《博古印谱》（苏州图书馆藏，索书号：L/2222）；5. 万历间陈跃九《博纂二王真草隶篆千文印薮书镜》（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索书号：306-0204）；6. 崇祯七年（1634）程正辰《印范》（苏州图书馆藏，索书号：L/2219）；7. 崇祯九年（1636）黄宸、苏晓《酣古集印谱》（香港松荫轩藏）；8. 崇祯九年（1636）黄湘《印韵》（香港松荫轩藏）；9. 明末朱敏树《印适》（山东省安丘市博物馆藏，文物登记号：2794）。

③孙志强：《生产成本、商业竞争与晚明印谱制作时长的关系》，《书法研究》2025 年第 5 期，第 136 页。

与集古类印谱相比,名家自刻类印谱的商品属性略低,印谱制作多属个人行为,制作过程中更容易遇到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不论何种类型的印谱,都可能面临制作资金短缺的情况,此时谱主往往需要多方筹措资金。

(一)捐资

当印谱制作遇到资金短缺时,最常见的解决方式是由友人捐资。这类捐资人一般不对印谱的内容产生影响。万历二十八年(1600),歙县岩寺印人王梦弼刊行《汇姓印苑》即由他人捐资。谱前方宇序云:

> 友人王叔卿力贫,无他嗜好,弱冠覃精研虑,远寻谱□,近谒宗工,应手得心,业既精专……叔卿贫士也,检校不能副其心,所需长乏,罔惬于意,然不施其功,励志良勤矣。是举也,家侄元素、若群,从伯衡,实为左右焉。①

从序言可知,王梦弼是一位"贫士",无法负担印谱刊刻的支出,这部印谱的刊行主要依靠友人方宇及其族人的赞助。方宇,字羽仲,号黟山,与王梦弼是同乡②。"家侄元素"乃方用彬,字元素,不仅精通篆刻,还经营文房用具、书籍字画及古玩等,并从事借贷典当业务,方弘静称"余侄用彬好游,家故饶也"③。

晚明时期,刊刻书籍的捐资人姓名往往以校订者的身份出现在书中。何朝晖在讨论冯梦龙《麟经指月》时注意到,该书参阅姓氏 95 人,除少部分是晚明名士外,其余俱为无名之辈;这一现象也存在于俞安期的《诗隽类函》中④。《诗隽类函》前载李维桢序,云:"自顷秘书往往间出,而苦于无剞劂费,传布不广。羡长杀青时,好事者有所资助,每被以订校之名。余两儿乳臭,亦点其中。然近自江南,远逮关中塞上,欣然趋附,以成好古右文之风。"⑤清代俞樾早已注意到,明人刻书时有卷前标注为"订"而实际为出资人的现象:"永怀堂《十三经注》,乃明崇祯间金千仞蟠、葛靖调

---

①方宇:《汇姓印苑引》,王梦弼:《汇姓印苑》,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钤印本(索书号:11617),叶一至二。

②方宇生平考证,详参陈智超:《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547 页。

③方用彬生平考证,详参陈智超:《方用彬及其亲友》,《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第 1—10 页。

④何朝晖:《晚明士人与商业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373—374 页。

⑤李维桢:《诗隽类函叙》,俞安期辑,梅鼎祚增定:《诗隽类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 211 册,齐鲁书社,1995 年,第 3 页。

鼐两人汇刻,卷首或题明后学金蟠订,或题明后学葛鼐订,盖刻书之资出其人耳。”①葛鼐为昆山人,他本人从事刻书业,是《承清馆印谱》《学山堂印谱》谱主张灏之婿,《学山堂印谱》卷前即载有他的名字。出资者列名校订者的现象,也存在于印谱中。崇祯元年(1628)余藻《石鼓斋印鼎》中的校阅、参订人署名方式即与何朝晖、俞樾所论甚为相似。《石鼓斋印鼎》九卷,除各卷卷端先后出现的校订人吴彬、商梅、余光之外,在卷前尚单独列有“同较阅姓氏”24 人与“同参订姓氏”23 人②,详见表 1:

表 1 《石鼓斋印鼎》校阅、参订人员表

署名类别	人员名单	籍贯
同较阅姓氏	胡宗仁	秣陵
	臧煦如	吴兴
	郑文昂	古田
	翁彭	建安
	李世熊	宁化
	田元丘	大田
	郑胤龙、林士颢	仙游
	洪宽、黄瑞霖、周婴、赵之璧、黄光、陈澣、朱泰桢、卢伯莪、柯士璜、林质、余廷机、余锋、余逵、余忠、余飏、余飚	莆田
同参订姓氏	邹道封、翁陵、张星、廖秉正	建安
	陈启元、朱廷彦	剑南
	连光藻	大田
	鲍桂、庄民标、欧万祺、林士题	仙游
	郑国侨、辛琛、黄彝、张洪材、黄廷锦、郑玉瑞、黄道周③、彭汝珍、黄飞鹏、黄星垣、黄梦吉、黄河	莆田

表 1 显示,这 47 人之籍贯,除南京胡宗仁与湖州臧煦如二人之外,其余皆为闽人。胡、臧二人虽然名列“同较阅姓氏”名单,但他们并没有在闽经历。其余闽籍校阅、参订之人,大部分籍贯为兴化府下辖的仙游、莆田二地,呈现出极高的地域聚集性。除了谱主余藻之弟余飏、余飚外,其余人的共同特点是不以功名名世,甚至在艺文上也不出众。需要格外注意的

①俞樾撰,徐明、文青校点:《春在堂随笔》卷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1 页。

②余藻:《石鼓斋印鼎》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元年(1628)钤印本(索书号:10524),叶一。

③按,该人非漳浦黄道周。

是,该谱卷端开列校订人吴彬、商梅、余光,他们才是该书的实际校阅者,但三人的名字未列入“同较阅姓氏”“同参订姓氏”,可见三人在该谱制作过程中所从事的工作与上述 47 人是有区别的。吴彬是晚明闽中最重要的画家之一。而商梅在艺文上同样较为著名,他工诗文、擅画山水,有《那庵诗选》二十卷、《种雪园诗》十卷行世,《列朝诗集》丁集卷十三载其传,《历代画史汇传》卷三二、《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八等载其名。余光为余藻之弟,据朱彝尊《经义考》载,余光、余飏善治《春秋》之学,二人曾合著《春秋存俟》十二卷①。吴彬、商梅、余光之身份与声名远较“同较阅姓氏”与“同参订姓氏”所列 47 人为著,相较而言,“同较阅姓氏”与“同参订姓氏”所列之人绝大多数都籍籍无名,这并不符合晚明书籍延请名士校对的风气,反而可能与李维桢所载“好事者有所资助,每被以订校之名”的情况相类。按照李维桢所说,这种现象“近自江南,远逮关中塞上,欣然趋附”,闽中自然亦有可能受到此种风气影响。

将校订人姓氏单独列出置于卷前的印谱,另有刊行于天启五年(1625)的休宁吴正旸《印可》,前列“校订友人姓氏”14 人,分别为:郑圭、许立言、许立礼、程康功、潘胤先、程士良、吴可选、黄敦顺、潘可达、吴明典、吴祚、江文澜、程明辅、程振玉。是谱编成前一年,吴正旸已去世,故由其子吴维心与其侄吴继心为之编集成谱。潘胤先《吴午叔印可引》云:

> 于是谋之余友程晋侯、吴长孺,因与其子若侄存父、元在律度错综,裒为两卷,广诸同好。②

序中所言程晋侯、吴长孺即“校订友人姓氏”中的程康功与吴祚二人。《印可》校订人署名的体例与《石鼓斋印鼎》一致,即在卷前“校订友人姓氏”中出现的人,并不在卷端出现,而真实的校对者同样不出现在卷前单独开列的校订人名单中。南京图书馆所藏《印可》卷端仅署“新都吴正旸午叔甫摹,侄吴继心存父甫、男吴维心元在甫集”,而无“校订友人姓氏”中的人员。据此,基本可以推测,《印可》一谱是吴正旸去世后其子侄在列入“校订友人姓氏”的 14 人的资助下刊成。

---

①朱彝尊:《经义考》卷二〇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 679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2008 年,第 699 页。

②吴正旸:《印可》卷首,南京图书馆藏明天启五年(1625)钤印本(索书号:GJ/EB/115613),叶三至四。

(二)助刻

与单纯的捐资者不同,在印谱制作中,另有助刻现象。助刻者不仅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还可能对印谱的内容编排、序跋征集等环节产生一定影响,甚至会直接参与印谱的制作环节。助刻本质上是一种更深度的参与行为,既解决了谱主个人财力不足的问题,也通过助刻者的协作,使印谱的内容更丰富、体例更完善。

万历三十六年,罗王常《秦汉印统》八卷由歙县商山吴元维助刻。《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载吴元维传,称:

> 易八七叔讳元维,字伯张,号濂水……服阙后以例入南雍,历满归理生业,而不屑铢铢两两为臣虏守。好结交缙绅先生、词人、技艺士,謦欬足以倾听,规模足以耸观,慷慨足以应人之缓急……山人王常集古图章若干,欲刻以传海内,而费重难堪,叔即捐赀刻成,命曰《印统》,今宇内图章取法焉。他如独刻《击壤集》,助刻《唐汇函》,志在成人之美,阿堵物可无爱也。至于亲族之贫者,必多方资给;有缓急而来告者,必委曲周旋。称贷者至于再,至于三,既不责偿,复不谢绝。亲族中感濂水者不少,负濂水者多矣。①

"费重难堪,叔即捐赀刻成,命曰《印统》"一语清楚地表明,《秦汉印统》由吴元维出资刊行,并参与该谱的最终命名。此外,他还助刻了《唐汇函》一书。故传中称其"慷慨足以应人之缓急""志在成人之美"。吴元维本人也有刻书经历,其所刻《击壤集》一书②,存传至今。由此可见,吴元维具备较好的出版素养,是兼具财力与刻书经验的助刻者。相较于普通捐资人,他对《秦汉印统》的刊刻参与度更深,不仅解决刊刻资金问题,还凭借自身刻书经验参与到成书环节,促成这部重要印谱的流传。关于《秦汉印统》的刊行经过,潘之恒《亘史钞》所记颇详,云:

> 罗龙文,歙呈坎人,别号小华……子某,更名王常,进之幸舍,潜心摹古,博雅绝伦,人以王生呼之,不测为何许人也。居海上四十年而始冠其姓名,曰罗王常,字曰延年。余从海上陈大参宅见之,年七

---

①吴应迁辑,吴凝吉续辑:《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国家图书馆藏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索书号:JP915),叶五十九。

②关于吴元维刻《击壤集》之缘起,详参吴元维:《伊川击壤集合注叙》,邵雍:《宋邵康节先生伊川击壤集》,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吴元维刻本(索书号:18355),叶一至二。

十矣。问其居,曰:“客顾氏城南别业。”明日,邀吴伯张往访之,则其居九品亭,延年所创也。视其业,方辑《秦汉印统》。先是,顾氏之《印薮》亦出延年手辑,而此《统》更广之。谓余曰:“未尽也。”乃出元人私印示之,累十余帙,不减数千章,其朱文之遒劲者,妙不容言。《统》则伯张镌行,而元印犹有待。余时赋一诗寿之,遽别去。抵虎丘,访友人苏尔宣,则赴伯张招,乃知入枣梨,剞劂氏皆名手也,时丙午首春日,越二年而《统》成。己酉寄我黄山,问延年无恙乎,则《统》甫竣而谢世矣,伯张大为之赙,舁其父子二榇还葬故鄣。庚戌春,乃为述其事,走书广陵,乞李太史本宁先生为之叙。①

罗王常《秦汉印统》的顺利刊行离不开吴元维的资助,故而在是谱版心处署有“吴氏树滋堂”字样(见图1②)。这是一种双方互惠的行为,罗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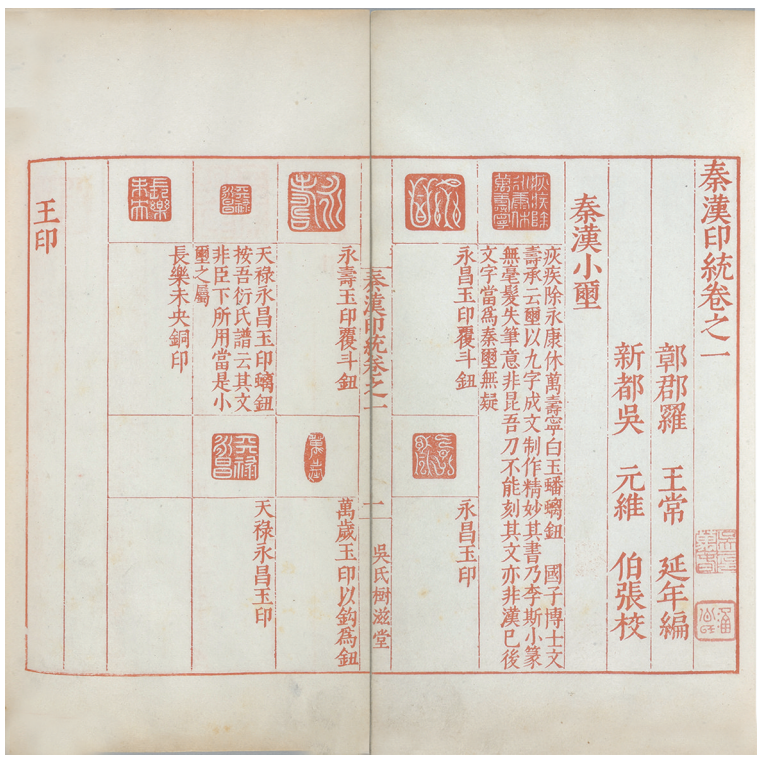


图1 《秦汉印统》

①潘之恒:《亘史外纪》游侠卷三《罗龙文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93册,第361—363页。

②罗王常编:《秦汉印统》卷一,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吴氏树滋堂刻本,叶一。

因吴元维之捐资得以顺利刊行其谱，因是谱之流传，吴元维的“吴氏树滋堂”亦为世人广知。而从潘之恒所说罗王常在《秦汉印统》“甫竣而谢世”一语可知，自万历三十六年开始，《秦汉印统》的发行、印刷以及序跋的增订等事宜完全由吴元维操持，由此可以推测，在罗王常去世后，《秦汉印统》的书版为吴元维所持有。

在晚明印谱的刊行过程中，助刻行为不在少数，但除佛经、地方志等书籍之外，古人较少直言捐资助刻之事，故而多数情况下容易被忽略。对于助刻者的考察，还需要联系谱主的经济状态与助刻者的其他助刻行为，从细微之处着手推测。

万历三十三年华亭陈钜昌《古印选》四卷即是一部值得注意的印谱。该谱中的文字均为手书字体刻印，摹印、制作俱精良，属明代上乘。谱主陈钜昌之父为董其昌之师，董其昌在《草玄阁读书记》一文中称陈钜昌为“沉冥贫士”①。张翼轸《陈氏古印选序》亦云：“余尝过懿卜，懿卜颓然短衣，苔花绣壁，多司成公五松先生故书，茶床酒枪粗具。”②可见陈钜昌的生活较为贫困。明清时期，影响刻书成本最大的因素即刻工之工价。书籍雕版时，手书体的工价往往较匠体工价更高。《古印选》全文以手书体入梓，写刻精良，意味着刊刻成本必然不低，这与陈钜昌“贫士”的形象不太相符。而综合谱中的一些信息可知，该谱的刊行可能也得益于友人的助刻。

该谱书口下方署“沈及之写并刻”（见图 2 ③）。这提示我们，该谱的刊行与沈思密切相关。沈思，字及之，松江人，工书能诗，有书坊梅居，刊刻时人诗文集多部。如万历三十六年搜辑并刊刻钱福《钱太史鹤滩稿》，是书卷首所载陆慎修《书鹤滩先生遗稿后》、《鹤滩先生纪事》、冯时可《鹤滩先生遗事》以及书末附录《翰林院修撰与谦钱君墓志铭》（署“城南沈思及之辑并书”，见图 3④），均为沈思楷书手写体，其字迹与《古印选》中文

①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四《草玄阁读书记》，《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32 册，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221 页。

②张翼轸：《陈氏古印选序》，陈钜昌：《古印选》卷首，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钤印本（索书号：善 000188），叶二。

③陈钜昌：《古印选》卷一，西泠印社藏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钤印本，叶一。

④钱福：《钱太史鹤滩稿》附录，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沈思梅居刻本（索书号：02326），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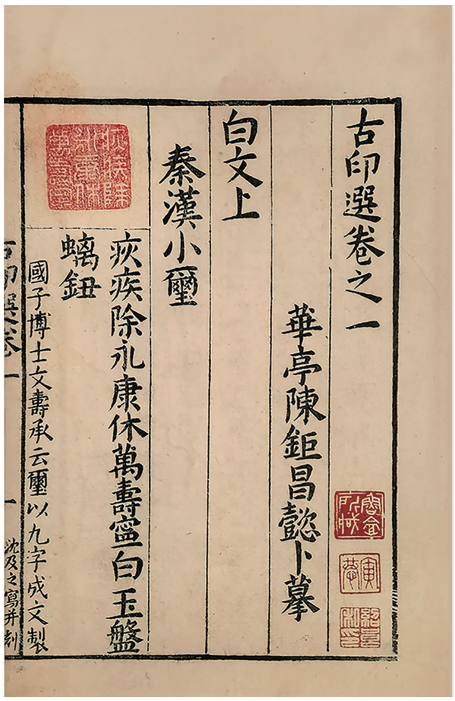

古印選卷之一
華亭陳鉅昌懿卜摹
白文上
秦漢小璽
疢疾除永康休萬壽盌白玉盤
蠲鈕
國子博士文壽承云璽以九字成文製

图 2 《古印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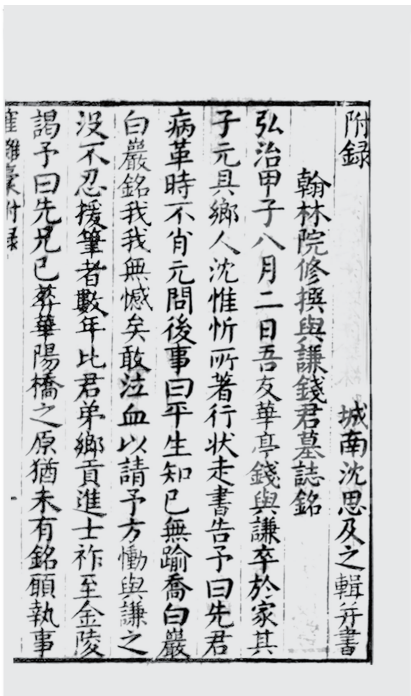

附錄
翰林院修撰與謙錢君墓誌銘
城南沈思及之輯并書
弘治甲子八月二日吾友華亭錢與謙卒於家其子元具鄉人沈惟忻所著行狀走書告予曰先君病革時不肖元問後事曰平生知己無踰喬白巖白巖銘我我無憾矣敢泣血以請予方慟與謙之沒不忍援筆者數年比君弟鄉貢進士祚至金陵謁予曰先兄已葬華陽橋之原猶未有銘願執事

图 3 《钱太史鹤滩稿》

字风格一致。

目前所见沈思刊刻的时人文集均为其出资助刻。万历三十年,他曾搜集并刊行莫是龙《莫廷韩遗稿》十六卷,陈继儒《刻莫廷韩遗稿题词》云:

> 莫廷韩昔作文豪,今为才鬼,有遗稿久藏人间,若不收拾付梓,便成太山无字碑矣。吾友沈及之哀其残篇短楮,便精简可传。若得士大夫少辅刻赀,不至散为酒鸱粉蠹,是以后死复生廷韩也。①

可知沈思有感于莫是龙死后文集散佚,为其搜集成书,并助刻发行。结合沈思刊刻《钱太史鹤滩稿》《莫廷韩遗稿》等书籍的行为来看,《古印选》也极有可能由沈思助刻行世。

从以上案例可见,晚明印谱的捐资、助刻行为深度嵌入地方性的人际网络之中。捐资者多为谱主的友朋、同乡,其目的不只出于纯粹的商业投

①陈继儒:《刻莫廷韩遗稿题词》,莫是龙:《莫廷韩遗稿》,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三十年(1602)刻本(索书号:317-0057),叶一。

资,更包含人情往来、声望交换等因素。而助刻者不仅提供印谱制作的资金,还深度参与印谱的制作环节,对印谱的制作产生较大影响。捐资、助刻之人的具体捐资数额,因史料阙如难以确考,但其规模必定直接影响印谱的成品品质与传播范围,资金充裕者,可聘请良工、选择佳纸、精摹细刻,乃至增加卷帙、完善装帧;反之,则可能制约制作规模与印谱质量。总而言之,捐资助刻行为虽隐匿于印谱背后,却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印谱的物质形态。

二、印谱定价及其消费群体

印谱以什么样的价格销售,不仅关乎谱主的收益,更制约着印谱的流通范围与传播广度。此外,不同类型的印谱在定价时有何差异,哪些因素影响印谱的定价,这些问题都能反映出印谱制作发行所遵循的商业逻辑。

(一)晚明印谱的价格

明代标注价格的书籍较为稀见,沈津、大木康等学者经过文献爬梳,整理出近 30 种标注价格的书籍①,其中包含 3 部印谱,分别是张学礼《考古正文印薮》、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和甘旸《集古印正》②。事实上,现存标注价格的印谱数量远超 3 部,据笔者梳理,至少有 13 部印谱标有价格,在已知的明代标价书籍中占比不小。这些印谱中的价格信息无一例外全部在牌记中,是谱主预设的理想价格。现将笔者所知见的印谱价格信息列于表 2,以便讨论。

---

①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04—108 页。[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 年,第 62—65 页。

②甘旸所编《集古印谱》(此系该书卷端题名),书中甘旸自序题作《集古印正自叙》(甘旸编:《集古印谱》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钤印本,索书号:13612),故学界通常称作《集古印正》。如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谓:"集古印正五卷附说一卷,明秣陵甘旸集,万历丙申印本。又名甘旭印正,亦名集古印谱。"(孙殿起录:《贩书偶记续编》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53 页)为便于与顾从德《集古印谱》区分,本文行文从学界惯例,以《集古印正》称之;注释则依卷端题名,以便检索。

表 2　知见晚明印谱价格表

序号	谱名	谱主	卷数	时间	制作方式	纸张	定价	现藏地或文献出处
1	集古印谱	顾从德	不分卷（两函12册）	隆庆六年（1572）	原印钤印	棉纸?	10两/部	上海图书馆（索书号:线善833516-27）
2	集古印谱	顾从德	六册	隆庆六年（1572）	原印钤印	不详	10两/部	张邦梁跋《清仪阁古印偶存》①
3	印薮②	顾从德	六卷	万历三年（1575）	木刻印刷	白鹿纸	0.7两/部	复旦大学图书馆(索书号:rb0452)
						荆川帘	0.6两/部	
4	印薮	顾从德	六卷	万历三年（1575）	木刻印刷	白鹿纸	1两/部	南京图书馆(八千卷楼旧藏本)
5	印薮	顾从德	六卷	万历间	木刻印刷	棉纸	1.5两/部③	上海图书馆(索书号:善843777-82)
6	印薮	顾从德	六卷	万历三年（1575）	木刻印刷	不详	1两/部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索书号:子245-0005)
7	印薮	顾从德	六卷	万历三年（1575）	木刻印刷	经文纸	1.5两/部	西泠印社

①张邦梁跋《清仪阁古印偶存》云:“印古真印成书者,明上海顾汝修所集印二十本为最善。其书官印一册,私印上下平声上去入声五册。卷首朱记四行,定其直曰:‘每本白金十两。’吾家旧有藏本,世颇珍之。”(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卷末,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五年[1835]钤印本,索书号:A02621)

②顾氏芸阁木刻本《集古印谱》,学界通常称作《印薮》,以区别于顾氏原钤本《集古印谱》。本文行文从学界惯例,径称《印薮》;注释则依卷端题名,以便检索。

③按,该本牌记原文“每部银一两五钱”,其中“一”字被墨书改动为“卅”字,乃递藏过程中后人所为。

续表

8	印薮	顾从德	六卷	万历三年（1575）	木刻印刷	不详	1.2 两/部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①
9	印薮	顾从德	六卷	万历三年（1575）	木刻印刷	白鹿纸	1 两/部	罗福颐《印谱考》卷一②
10	考古正文印薮	张学礼	五卷	万历十七年（1589）	摹刻钤印	不详	1.2 两/部	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③
11	宣和集古印史	来行学	官印八卷，私印不详	万历二十四年（1596）	摹刻钤印	棉纸	1.5 两/套（官印）；3 两/二套（私印）	国家图书馆（索书号：06439）
12	集古印正	甘旸	五卷，附印说一卷	万历二十四年（1596）	摹刻钤印	不详	0.3 两/部	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卷十
13	秦汉印范	潘云杰、陆鑵	六卷	万历三十七年（1609）	摹刻钤印	棉纸	3 两/部	上海图书馆（索书号：善 824751－55）

在正式讨论之前，要先对孙殿起《贩书偶记续编》中所记甘旸《集古印正》的价格略作分析。《贩书偶记续编》称该本“计六册，每部纹银三钱”④，这一价格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以其他几部摹印本印谱之价格来看，《集古印正》不可能定价“每部纹银三钱”，这远远低于同类型、同体量

①按，该本笔者未见。据郭立暄著录，该本为“日本东京博物馆福井端隐旧藏本，内封叶有玉玦印，有‘水花朱双印，每部价白银一两二钱，恐有赝本，用古玉玦印记’戳记”（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中西书局，2015 年，第 325 页）。

②据罗福颐著录，“此谱前署太原王常延年编，武陵顾从德汝修校，分六卷。前有乙亥秋王稚登序……序前叶有朱印古玉玦一，下有木戳一方，云：白鹿纸，水花朱双印，每部价银一两，恐有赝本，用古玉玦印记”（罗福颐：《印谱考》卷一，桑行之等编：《说印》，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724 页）。

③据沈津著录，该本扉页钤有“墨刷朱砂印，上白供单纸，宋笺壳衣，绩绫套，每部价银壹两贰钱”（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第 106 页）。

④孙殿起录：《贩书偶记续编》卷十，第 153 页。

印谱的售价,极有可能是孙殿起误将“三两”记为“三钱”。沈津在《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一文中误认为甘旸《集古印正》是木刻本,并在此基础上认为“钤印本上的每一方印,都需人工手钤,端端正正,费时费工,故价钱不菲。而刻本则一板而成,刷印之工本甚低,故价不高”①,将孙殿起所记定为确凿之语,并据此得出木刻本价格较钤印本低的结论。大木康引用沈津研究时,则径直将“每部纹银三钱”改为“每部纹银三两”②。虽然大木康对此改动没做任何说明,但是能够看出他已经觉察出“三钱”是不符合明代印谱价格规律的。不妨以同为万历二十四年刊行的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与之对比。《宣和集古印史》后载各种印泥价格,云:“宝印斋监制珊瑚、琥珀、真珠朱砂印色,每两实价五钱,朱砂印色,每两实价二钱。”③其中珊瑚朱砂印泥是制作《宣和集古印史》所用印泥,《宣和集古印史》和甘旸《集古印正》同一年成书,断无一部《集古印正》之价格比不过一两印泥价格之理。从同类印谱来看,“三两”方符合该谱的正常价格。

分析表 2 中 13 种印谱的价格可知,隆庆至万历后期,印谱价格的大致规律是原钤本高于摹印本,摹印本高于木刻本。此外,还可以得到一些关键信息:

一是标注价格的印谱无一例外均为集古类印谱,名家自刻类印谱则未见标价者。两者相较,集古类印谱因具有篆刻“典范”的性质,有较高的市场流通价值,故常作为商品,定价出售;而名家自刻类印谱多是为了满足同好间的交流品评而刻,重在呈现个人的艺术造诣,并非用于市场交易,故而无需公开定价。

二是翻刻本印谱的价格未必低于原刻本。从板框与印蜕的对比校勘结果来看,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所藏《印薮》均为姚起原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为翻刻姚起刻本,以上三部印谱的价格并不取决于原刻与翻刻,而是取决于印刷用纸,前两者使用的是竹纸,后者使用了绵纸,故而造成了价格的差异。

---

①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第 106 页。

②[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第 63 页。

③《印则》,来行学校摹:《宣和集古印史》卷末,国家图书馆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氏宝印斋钤印本(索书号:06439),叶四。

三是大部头印谱存在拆开发售的现象。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牌记载:“定价:官印,一套纹银一两五钱;私印,二套纹银三两。”①从官、私印分别定价来看,该本存在拆开发售、分别定价的现象,这与沈津所观察到的晚明《黄氏画谱》八种,每种可以“零拆售卖”②类似。

(二)影响印谱定价的因素

上文已就印谱的价格做了简要讨论,接下来尚需进一步探讨,决定一部印谱价格最重要的因素以及决定原钤本、摹印本、木刻本定价差异的商业逻辑。影响书籍价格的因素有很多,胡应麟认为:

> 凡书之直之等差,视其本,视其刻,视其纸,视其装,视其刷,视其缓急,视其有无。本视其钞刻,钞视其讹正,刻视其精粗,纸视其美恶,装视其工拙,印视其初终,缓急视其时,又视其用,远近视其代,又视其方。合此七者参伍而错综之,天下之书之直之等定矣。③

胡应麟将底本、刻工、纸张、装潢、印刷、年代以及存世量等视为影响书籍价格的主要因素,这个观点一直被广泛引用。但印谱有其特殊性,是一类特殊的“书籍”,胡应麟的观点不能完全涵盖印谱的定价逻辑,或者说,这些要素在印谱定价时并不一定起决定性作用。决定印谱定价的最主要因素是制作方式。从制作方式来说,明清时期的印谱无外乎原印钤印、摹刻钤印与木刻印刷三种。

在上文所论标注价格的印谱中,定价最高者为隆庆六年(1572)原钤本顾氏《集古印谱》,每部高达白银 10 两,定价最低者为万历三年荆川帘纸印刷的木刻本顾氏《印薮》,每部仅 0.6 两,二者定价极为悬殊。究其原因,是制作方式的差异所致。原钤本径直以古玺印钤盖而成,印谱的制作者必须收藏有一定量的古玺印,这也意味着谱主需要投入大量精力与财力搜购古玺印。顾氏《集古印谱》共计收印 2335 方④,这些印章绝大部分为顾氏家族历经三代人搜集而来,沈明臣《集古印谱叙》云:

> 自御医公世安氏搜购始,及光禄君汝由、鸿胪君汝修、大理君汝

①来行学校摹:《宣和集古印史》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氏宝印斋钤印本,牌记页。

②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第 105 页。

③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886 册,第 209 页。

④数据据上海图书馆藏本统计。

和、光禄子天锡，历祖孙父子兄弟绵远矣，而搜购远近，不遗余力，乃董董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①

从沈氏之序可知，顾氏古玺印收藏并非一蹴而就。嘉靖三十四年（1555）前后，顾氏家族已经入藏了相当数量的古玺印②，至《集古印谱》成书的隆庆六年，顾氏所藏已经达到“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铜印一千六百有奇”。可以想见，顾氏族人在跨越三代搜购古玺印过程中的付出。加之古玺印本身极为珍贵，历经千年水土侵蚀，印面不平，钤拓不易，故而顾氏仅制成《集古印谱》20部。从顾氏家族漫长的搜购过程以及原印钤盖的不易来看，《集古印谱》高昂的定价是容易理解的。

在完成了20部原钤本《集古印谱》后，顾氏家族随即放弃了原钤的方式，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对《集古印谱》进行翻刻与增补，此即顾氏芸阁木刻本《印薮》。木刻本《印薮》是将谱中文字、印章一并雕刻在书版上印刷成书，制作过程少了钤印步骤，变得相对容易，且易于复制，故其价格较原钤本而言十分低廉。这也是同为顾氏家族所制作的印谱，二者之间定价相差十余倍的原因。

定价介于原钤本与木刻本之间的是摹印本印谱。与原钤本印谱相比，摹印本印谱虽然也是以印章钤盖而成，但所用却非珍贵的古玺印，而是先由印人摹刻古玺印，再以此钤盖成谱。从晚明时期摹印本印谱的载印范围来看，各本印谱均以《印薮》为底本，加以增删而成。在摹印本印谱的成书过程中，谱主往往会延请专业印人为之摹刻，例如《秦汉印范》一谱，谱主潘云杰即延请当时十分著名的两位篆刻家苏宣、杨当时为之摹刻；又如万历三十七年河南睢阳孙如兰知希斋本《印选》，谱中印章是由南京印人胡养中为之摹刻。与木刻本印谱相较，摹印本印谱多出印章摹刻、钤拓等工序，这些工作也涉及薪资支出，毫无疑问会抬升制作成本，故其价格较之木刻本又高出不少。《考古正文印薮》《宣和集古印史》《集古印正》《秦汉印范》均为摹刻钤印而成，其定价为1.2~4.5两不等，基本高于木刻本《印薮》。

---

①沈明臣：《集古印谱叙》，顾从德编：《集古印谱》，上海图书馆藏明隆庆六年（1572）钤印本，叶五至六。

②顾氏族人在嘉靖三十四年前后曾购得丹阳孙桢所藏古玺印40余方。详参孙志强：《明代孙桢古玺印鉴藏及其〈印谱释考〉研究》，《书法研究》2022年第4期，第85—88页。

除了制作方式决定印谱的定价逻辑之外，前揭胡应麟指出的纸张、刻工字体、装潢等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印谱定价。如复旦大学图书馆所藏《印薮》姚起原刻本揭示了不同纸张印刷所带来的定价差异，其中白鹿纸本售价为每部 0.7 两，荆川帘纸本售价为每部 0.6 两，二者相差 0.1 两，这一钱之差即缘于印刷时的用纸不同。上海图书馆所藏翻刻姚起本《印薮》为棉纸印刷，每部 1.5 两，是本虽为翻刻本，但其定价仍然较姚起原刻本高出不少，亦可看作是受印刷纸张影响之故。

在标有定价的印谱中，除顾氏原钤本《集古印谱》定价最为高昂之外，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的定价紧随其后。按照牌记所示，该谱官私一套，私印两套，售价合计达 4.5 两，接近顾氏《集古印谱》定价的一半，远远高出同为摹印本的《考古正文印薮》《集古印正》《秦汉印范》，除了体量大、用纸讲究之外，是谱书版中所有文字全部以手书仿颜真卿字体写版（见图 4①），也影响着该谱的定价。影响古代刻工工价高低的一项重要因素即是所刻字体的大小与样式。《考古正文印薮》《集古印正》《秦汉印范》等印谱采用万历年间已经流行的匠体字雕版，其刻工薪资必然要较《宣和集古印史》低，这几部印谱的价格自然也就低于《宣和集古印史》。此外，《宣和集古印史》装潢考究，“珊瑚朱砂印色覆印，衣绩绫套，藏经笺面”②，可能也是导致定价较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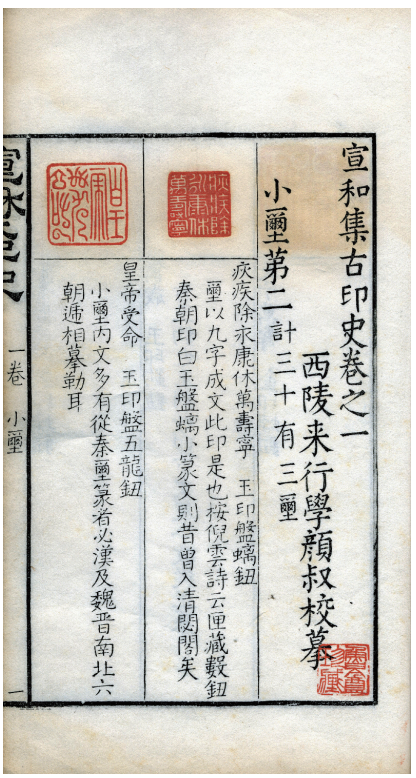

宣和集古印史卷之一
西陵来行學顏叔校摹
小篆第二 計三十有三篆
疢疾除永庸休萬壽寧 玉印盤螭鈕
篆以九字成文此印是也按倪雲詩云匣藏穀鈕
秦朝印白玉盤螭小篆文則昔曾入清閟閣矣
皇帝受命 玉印盤五龍鈕
小篆內文多有從秦篆者必漢及魏晉南北六
朝遞相摹勒耳
宣和集古印史 一卷 小篆 一

图 4 《宣和集古印史》

综上可知，制作方式是决定一部印谱定价多寡的最主要因素，印谱用纸、雕版字体以及装帧差异也会对印

①来行学校摹：《宣和集古印史》卷一，西泠印社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氏宝印斋钤印本，叶一。

②来行学校摹：《宣和集古印史》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氏宝印斋钤印本，牌记页。

谱定价产生一定影响。

(三)印谱价格与同期书价对比

在厘清晚明印谱自身定价规律的基础上,尚有必要将其与同时期的普通书籍价格略作比较,以揭示印谱的独特性。

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一文整理了明代后期部分书籍之价格,其中《大明一统志》《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均为每部 3 两①,与印谱价格较为接近,然其卷帙浩繁,《大明一统志》九十卷,16 册,《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二百二十一卷,37 册,在体量上都远超印谱。

彭信威在讨论古代书籍价格时称:"自印刷术发明及应用以来,中国的书价有下跌的倾向,而以明代为最低。这种倾向同白银购买力变动的倾向是相符合的。"②大木康、周启荣等均认为 1 两白银是明代后期普通书籍价格的上限③。回到沈津所列出的晚明书籍价格可以看出,与集古类印谱卷数相仿的几部书籍售价均为 1 两,如万历四十六年刻本《新刻李袁二先生精选唐诗训解》七卷、崇祯九年(1636)刻本《广金石韵府》五卷④。排除体量浩繁的大部头书籍,如果以 1 两白银作为明代后期普通书籍的相对价格上限,则晚明印谱的定价远超这一数值,尤其是顾氏《集古印谱》,来行学《宣和集古印史》,甘旸《集古印正》,潘云杰、陆鑵《秦汉印范》等,价格可谓相当高昂。

与普通书籍相比,造成印谱价格高昂的因素,除了制作方式较为复杂外,尚与其独特的内容有所关联。在内容上,印谱与画谱、石谱类似,以视觉图像为主,这类出版物所提供的阅读体验,本质上在于品鉴与欣赏,是士人消遣之一途,故而在晚明士人眼中,印谱"足为风雅之一助也"⑤,

---

①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第 104—105 页。

②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校订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年,第 570—571 页。

③[日]大木康著,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第 65 页。[美]周启荣:《明清印刷书籍成本、价格及其商品价值的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1 期,第 9 页。[美]周启荣著,张志强等译:《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 世纪》,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66—67 页。

④沈津:《明代坊刻图书之流通与价格》,《书韵悠悠一脉香:沈津书目文献论集》,第 106—107 页。

⑤何泽民:《印薮搜奇跋》,鲍钊:《印薮搜奇》卷首,香港松荫轩藏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钤印本,叶二至三。

“阅之殊快心目”①。在印谱序跋中,明人将这类阅读称为“披赏”“清赏”“闲阅”等。这一时期,以“赏”“品”等字为名的印谱即有多部,如万历三十九年朱简《印品》、天启四年释隆彩《古今印赏》、崇祯六年夏树芳《演露堂印赏》、崇祯九年范孟嘉《印品》。像画谱、印谱这类以视觉图像为主要内容的书籍,并非为一般识字者制作,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此类书籍在市场中的高端定位与价格水平。

(四)印谱的消费群体

印谱高昂的价格,与其最终消费群体密切相关。商业出版中,书籍刊行的最终目的是被消费、被阅读。书籍在编纂之前,会有其预设的消费群体或阅读群体,印谱也不例外。从印谱的序跋、凡例中,即可看出印谱的预设消费群体是什么样的人。在多部印谱中,这些人被谱主、序跋者称为“同好”“同志”“博雅君子”。这些称谓各有侧重,“同好”“同志”强调其印人身份,而“博雅君子”则指向拥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文人群体。当然,这两类群体无法截然分开。

隆庆六年,上海顾氏制作的 20 部原钤本《集古印谱》甫一行世即售卖一空,在这 20 部《集古印谱》中,有一部格外引人瞩目。这部印谱现存二卷,其中卷一藏于浙江图书馆②,卷四藏于香港松荫轩,二者皆钤有晚明篆刻史上最负盛名的印人文彭的鉴藏印:“文彭之印”朱文印、“文寿承氏”朱文印。另外,浙江图书馆所藏卷一中,尚钤有嘉兴李日华的鉴藏印。从这些印记可知,文彭、李日华曾拥有过这部印谱。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张学礼的《考古正文印薮》(索书号:故观009156-009157),其中有一段新安印人郑基相崇祯七年的手书题识,云:

> 余此本从崇祯壬申售自京陵友人李君实处,其时有旧本《六书

①朱之蕃题辞,程远摹选:《古今印则》卷首,香港松荫轩藏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钤印本。笔者目验《古今印则》多部,朱之蕃此题辞仅见于香港松荫轩藏本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藏本(残本),其余藏本如国家图书馆所藏两部(索书号:05839、12955)、南京图书馆所藏两部(索书号:GJ/EB/115606、GJ/EB/120218)、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藏本(索书号:11180)、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本(索书号:T/6416/2133)均未载此题辞。松荫轩藏本为二册本,内容较他本少,除朱之蕃题辞外,下文所引该谱内容皆据国家图书馆藏本(索书号:12955)。

②浙江图书馆编:《浙江图书馆藏国家珍贵古籍题跋图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 241 页。

正讹》《六书精蕴》及此谱，共得三部。其《正讹》《精蕴》字画清爽，形神欲舞，系初板无疑，可称至宝。然此本虽从翻刻选订□之诸蔟，犹得完神，但习雕虫者，当于六书字学钻研，则图书之章法、笔法、刀法，自无全才矣。甲戌仲春郑弘佑识。（隔行钤"郑基相印"白文印、"弘佑"朱文印）①

从此题识可知，这部《考古正文印薮》是郑基相于崇祯五年自李日华处购得的。虽然未见李日华操刀刻印的记载，但从其购藏《集古印谱》《考古正文印薮》的情况来看，他对阅读印谱有浓厚兴趣。李日华为万历年间江南地区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味水轩日记》②中记载了他购藏书画作品的信息，其身份完全符合晚明印谱所预设的消费者身份。从李日华处购得《考古正文印薮》的郑基相则是明末清初徽州地区知名的印人，周亮工《赖古堂印人传》载有其传③。在写下这篇题识的次年，郑基相制作发行了自己的印谱《郑弘佑印谱》二卷。

印人购藏印谱的例子还有许多，如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所藏甘旸《集古印谱》（索书号：307.3 06770）卷端钤有"钱覲印信"白文印、"波斋"朱文印各一方，这两方印章的主人是明末清初的印人钱覲，其人有《波斋印谱》行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秦汉印统》钤有吴万春的鉴藏印三方："吴万春印"朱白文印、"涵公氏"朱文印、"吴万春印"白文印。吴万春是新安人，活跃于明末清初，与其父吴山皆以篆刻名世，传记同样见于《赖古堂印人传》④。此外，在一些著录印谱的书籍中，也可以见到印人购藏印谱的记载。如日本乡纯造《印谱考略》一书著录程远《古今印则》，谓该谱钤有薛居瑄之收藏印⑤。薛居瑄为晚明闽中印人的代表，周亮工称其刻印长达四十年⑥。庞士龙《云斋旧藏善本印谱目忆录》著录苏宣《苏

①按，该谱书况欠佳，尚待修复，笔者无缘得见。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古籍科曾纪刚先生代为检阅，并抄录郑氏题识。

②李日华著，屠友祥校注：《味水轩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③周亮工著，印晓峰点校：《赖古堂印人传》卷三《书郑弘祐图章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4页。与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合一册。

④周亮工著，印晓峰点校：《赖古堂印人传》卷三《书吴仁长印章前》，第54页。

⑤[日]乡纯造编：《印谱考略》卷上，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明治三十年（1897）刊本，叶四。

⑥周亮工著，印晓峰点校：《赖古堂印人传》卷三《书薛弘璧印章前》，第56页。

氏印略》,谓该谱为顾苓旧藏①,顾苓是继文彭之后,苏州地区最重要的印人之一。可见,印人群体是印谱消费的主力军。

晚明时期的印谱大多制作精良,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故而在一些鉴藏家眼中,印谱成为一种新兴的可供赏玩的书籍。正是印谱的这一特性,使其消费者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印人群体,而是扩大到上层文人之中。张丑之父张应文是晚明十分有名的文人,也是一位重要的书画鉴藏家,他在《清秘藏》中特辟"叙古今名论目",列举"考古之士不可缺者",这些书目涉及书画鉴藏、古琴、古玩、砚台、墨、画谱等内容,其中即有多部印谱,如赵孟頫《印史》、姜夔《集古印谱》、杨克一《图书谱》、王厚之《复斋印谱》、吾衍《古印文》、顾从德《印薮》②。现藏于开封市图书馆的《集古印谱》(索书号:289.6/17)③能够与张应文所言相呼应,该谱卷一、卷二卷端钤有宋筠"雪苑宋氏兰挥藏书记"朱文印。宋筠是明末清初著名士人宋荦之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有诗名,藏书众多,他的身份既是"博雅君子",又是"考古之士"。像张应文、宋筠这类文人,也是印谱重要的消费群体。

三、印谱的营销策略与版权意识

晚明时期印谱的流行,并非纯粹艺术思潮推动的结果,它与商业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集古类印谱,带有明显的射利倾向。谱主会通过多种营销策略提升印谱知名度,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提高收益。

(一)印谱的营销策略

万历以降的各种集古类印谱,在谱名、序跋、凡例中时常见到宣传性质的用语,包括申说印章来源的可信,强调内容的典范、制作的精良与摹刻的准确等,这些用语可以看作谱主的营销策略。

利用书名以吸引读者是明人书籍编纂的一大特色。在明人戏曲、小说中,"以'奇'、'异'、'怪'、'艳'等作为书名的现象相当普遍,或将'才

①庞士龙:《云斋旧藏善本印谱目忆录》卷二,李万健、邓咏秋编:《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第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325页。

②张应文:《清秘藏》卷下"叙古今名论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第26—27页。

③按,该本二卷,二册,不署编者、校者之名,前载黄姬水《集古印章序》一篇,移自顾氏《印薮》,印章主体部分亦摹刻自《印薮》,为明末摹刻本。

子’字样嵌入书名,以‘才子书’招揽读者”①。晚明时期的日用类书书名多带有“全书”“全编”“博览”“万卷”等字样,突出此类书籍包罗万象的特点。成谱于万历后期的印谱《博纂二王真草隶篆千文印薮书镜》亦深受此种风气影响,为明代谱名最长的印谱②。该谱为木刻本印谱,内容是篆刻《千字文》,每句一印,印下附有楷书、草书、隶书释文。该谱由书林陈跃九刊行,假托晚明声名正隆的李贽作为集印人,以此吸引读者的关注。在谱名中,“博纂”“印薮”“书镜”等词汇,既指明是谱内容丰富,又强调该谱可资镜鉴的功用,虽然该谱制作水平较为低劣,如印章篆刻板滞,楷书、草书、隶书与谱名所示“二王”风格也全无关系,但在营销宣传层面却颇为用心。

制作精良的印谱更加注重宣传策略。从印谱的命名来看,万历中后期以降的几部重要摹印本印谱都带“正”“范”“则”等词,这些词汇最终均指向所载印章的严谨性与典范性,是一种典型的宣传用语,如张学礼《考古正文印薮》的命名方式,即重点突出“正文”二字。所谓“正文”,是针对顾氏《印薮》收印庞杂错讹而言,张学礼云:

> 别有文理省脱,牵连凿异,或古人用之军中,怆卒趋便,实非正文,已无足取。况诸谱混,又以左文悖义者一概收之,指曰缪篆,讹益甚矣,今尽删之。③

与“正文”类似的词汇还有“正”。万历二十四年,南京甘旸《集古印正》行世,徐熥《序甘旭印正》将是谱与顾从德的《印薮》对比,称:

> 武陵顾氏所刻《印薮》,搜罗殆尽,摹勒精工,稍存古人遗意。第流传既广,翻摹滋多,舍金石而用梨枣,其意徒以博钱刀耳,令古人心画神迹湮灭失真,良可叹息。秣陵甘旭,自大父廷评公博物好古,多蓄秦、汉金玉,虽间有散逸,而存者尚夥。旭复工于六书,精于鉴赏,暇日取其先世所存印章,较今坊肆所翻者,多有舛错。于是手勒金

①程国赋:《论明清小说书名的广告意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0期,第1页。

②署李贽集:《博纂二王真草隶篆千文印薮书镜》,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万历间陈跃九刻本(索书号:306-0204)。

③《考古正文印薮凡例》,张学礼汇选:《考古正文印薮》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七年(1589)钤印本(索书号:19180),叶一。

石，历七年得印一千七百有奇，名曰《印正》，行之于世。①

从徐燉的论述中可见，《集古印正》之所以命名为“印正”，是因为《印薮》的翻刻本“多有舛错”，导致古玺印形神“湮灭失真”，甘旸的《集古印正》则是对翻刻本《印薮》的修正。汪廷讷在《集古印正序》中也有“自有《印正》之编，然后可以正天下之不正者”②之论。

以“范”字名谱者，强调印谱具有“典范”的性质，如潘云杰的《集古印范》与《秦汉印范》二谱。在谱主与序跋者的论述中，这类印谱可以看作篆刻临习的典范，如张所敬称《秦汉印范》“不惟大小方员，仿佛旧制，其刀法笔意，宛与古刻相肖，无毫发爽也”③，就是站在“典范”角度的论述。“则”字则是“法则”“典则”之意，同样意在突出印谱的典范性。如《古今印则》张纳陛序称谱主程远感慨于“今刻之仿《薮》不知其原”，故“精择而谨摹之”，制成印谱，并将其命名为“印则”④。

除在谱名中采用吸睛词汇外，序跋中亦不乏营销策略，多以对印谱的揄扬宣传之语呈现，如“百年”“千载”“万世”“不朽”等词尤其受到序跋者的青睐。潘锡祚为甘旸《集古印正》所作序言云：“余阅其书，皆妙选精当，摹拟入神，令千百载后复睹古人神迹心画，真若山阴道上行，目不暇接，聚狐成裘，心亦良苦已，倘所谓神解者非耶？”⑤徐燉在《序甘旭印正》中也谈到是谱“实留古人之精神于万世”⑥。王穉登为方用光《古今印

①徐燉：《序甘旭印正》，甘旸编：《集古印谱》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钤印本（索书号：13612），叶一至二。按，此本为初印本。《集古印正》初印本与修订本存在一些差异，初印本各卷卷端存“秣陵甘旸　旭编/溧阳张沛孟雨校”题名，修订本（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钤印本，索书号：A01422、03224、16500）中“溧阳张沛孟雨校”七字被剜除，且卷三“杨鼻”一印替换为“杨褒”、卷五“率真斋”“吴公遂印”替换为“郑如雨”“朱承采”印。下文所引《集古印正》内容，如无特殊说明，皆从初印本录出。

②汪廷讷：《集古印正序》，甘旸编：《集古印谱》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钤印本（索书号：A01422），叶二。按，汪廷讷序未载于初印本，故从此本录出。

③张所敬：《潘氏集古印范序》，潘云杰、陆鑵编辑：《秦汉印范》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钤印本（索书号：824751-55），叶二。

④张纳陛：《印则序》，程远摹选：《古今印则》卷首，叶二。

⑤潘锡祚：《印正小叙》，甘旸编：《集古印谱》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钤印本（索书号：03224），叶二至三。按，潘锡祚序未载于初印本，故从此本录出。

⑥徐燉：《序甘旭印正》，甘旸编：《集古印谱》卷首，叶三。

选》作序时称该谱“垂珍文于不朽”①。张翼轸序《古印选》时称“盖浹岁而摹始成,真不朽盛事矣”②。王士昌序《方元长印谱》也称方逢吉“勒成一谱,为不朽盛事”③。这类过度揄扬的话语并非简单的谀词,而是一种引导潜在读者购谱的宣传策略,董其昌在《潘元道印章法序》中明确地说:“谈论凿凿,一切传述古人,洵心手俱灵,发先民之所未发,展玩久之,不图汉官威仪复见今日,有意摹古之士,须从此谱作导师可也。”④万历三十九年,张纳陛在《古今印则》序中也有类似表述:“付之剞劂,以为后学津梁,有索神于汉印者,舍《印则》何之焉?”⑤

名家序跋的背书对印谱知名度的提升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利用序跋进行书籍宣传并非印谱的专利,但印谱序跋的宣传往往过于夸大其词。万历中后期,印谱刊行之风十分兴盛,各谱之间的市场竞争也较为激烈,故而各家不得不在序跋中极力宣传,甚至有些时候为了抬升己谱而刻意贬低他谱。如前揭徐熥《序甘旭印正》一文所言顾氏《印薮》“其意徒以博钱刀耳,令古人心画神迹湮灭失真”,又如邵名世在为《曲水轩印志》作序时称“是书出而《印薮》《印苑》《印选》充栋诸编俱可庋阁置矣”⑥。这类评述谈不上客观,仅可看作一种宣传手段。

与序跋中的一味揄扬相比,凡例中的营销用语通常会具体地告诉读者印谱有哪些优点。凡例原本主要针对一部书籍的编纂主旨、编纂方法、编纂体例、内容来源等进行发凡说明。祁晨越认为,明代书籍在凡例中进行自我营销的情况流行于天启、崇祯间,“越来越多的刻书者热衷于为书籍

①王穉登:《古今印选序》,方用光:《古今印选》卷首,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本(索书号:线普 552617-20)。

②张翼轸:《陈氏古印选序》,陈钜昌:《古印选》卷首,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钤印本,叶二。

③王士昌:《方元长印谱序》,方逢吉:《方元长印谱》卷首,湖北省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钤印本(索书号:子八/2),叶七。

④董其昌:《潘元道印章法序》,潘茂弘:《印章法》卷首,西泠印社藏明崇祯八年(1635)刻本,叶二至三。

⑤张纳陛:《印则序》,程远摹选:《古今印则》卷首,叶三。

⑥邵名世:《印志序》,黄赏:《曲水轩印志》卷首,南京图书馆藏明末钤印本(索书号:GJ/KB2311),叶二。

编写凡例,并利用凡例为自己的书籍打广告做宣传”①。实际上,依靠凡例进行自我宣传的营销策略在万历年间的集古类印谱中早已屡见不鲜。

凡例中的营销用语首先表现在强调印章来源的可信。虽然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摹印本印谱的印章均翻刻自《印薮》,但在凡例中,却又都诡称所收印章来源于收藏家所藏原印。万历二十四年甘旸《集古印正》凡例云:“集印以诸世家收藏秦汉旧印为主,次以杨、赵诸谱及好事者所集印册。”②万历三十五年潘云杰《集古印范》凡例云:“兹精模刻石,合收藏家古玉铜章,以朱砂手印作谱,宛然秦汉真迹,观者自能具眼。”③天启元年徐而化《印苑》凡例云:“是编博采诸名家印谱,有可取者,悉双钩不爽,精模临刻,毫发必肖,以及收藏家古玉铜章未经行世者,俱遍拘选入,间有新增拟配以补古名人之不及博者,庶令披阅者无遗憾。”④这些印谱凡例所宣称的印章来源并不可信,仅仅是营销策略而已。

此外,在多部印谱凡例中,时见特意强调内容精选的论调,借此突出它们与木刻本《印薮》之间的差异以及对《印薮》的超越。这类印谱都批评《印薮》收印或过于庞杂,或有遗漏,如万历三十五年潘云杰《集古印范》凡例云:“是编大都仿《印薮》,亦多《印薮》未载者。”⑤万历四十年释自彦《图书府印谱》凡例云:“旧谱不识之印,载之无益,今故不收。”⑥程远在《古今印则》凡例中也对《印薮》进行了极为严苛的批评:“云间顾氏《印薮》《印统》,务在博收,其中既杂凡庸,复多重叠,殊混雅观,今录其可法可传并《印薮》《印统》未收者,次序成帙,余则十删其六七。”⑦

集古类印谱最重要的功能是为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古印范本,内容选择的精准合理极为重要。然而,万历以降集古类印谱凡例中的营销用

---

①祁晨越:《明代杭州地区的书籍刊印活动》,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77—178页。

②《集古印谱凡例》,甘旸编:《集古印谱》卷首,叶一。

③《印范凡例》,潘云杰:《集古印范》卷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钤印本,叶一。

④《印苑凡例》,徐而化集:《印苑》卷首,日本蓬左文库藏明天启元年(1621)钤印本(索书号:64-57),叶一。

⑤《印范凡例》,潘云杰:《集古印范》卷首,叶一。

⑥《凡例》,释自彦:《图书府印谱》卷首,重庆图书馆藏明万历四十年(1612)钤印本(索书号:B17/2:5/1726),叶四。

⑦《古今印则凡例》,程远摹选:《古今印则》卷首,叶一。

语,并不能与印谱质量相吻合,如陈钜昌《古印选》凡例云:“‘寿亭侯印’,顾谱不备,今从《学古编》摹入。”①检《古印选》所载该印(见图 5②),印文盘叠,字法错讹,并非汉代之法。实际上,从宋代开始,民间多铸“寿亭侯印”,用以关庙“奉庙祭”,南宋洪迈早已指出这种现象,并且记载了几枚所谓的“寿亭侯印”,其形制“其上大环,径四寸,下连四环”③,而《古印选》所载“寿亭侯印”与洪迈的描述类似。在《印薮》刊行之前,也时有类似的“寿亭侯印”出土④,并且顾氏《印薮》凡例中曾提及“吾子行《学古编》并得收入……亦所不遗”⑤之语,可知顾从德并非漏收“寿亭侯印”,而极有可能是发现该印不符合汉代印章形制,加以汰除。各谱凡例虽然都谈到对《印薮》载印的增删选择,但其实际选印都未超越《印薮》,这也间接说明印谱凡例中的言论只是一种发行时的宣传策略。



图 5 《古印选》“寿亭侯印”

钤印成谱是印谱有别于普通书籍的根本特征。顾氏《印薮》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成谱,流通广泛,影响深远,但这种成谱方式也成为后世批评的对象。万历中期以后,印谱凡例几乎都在批评《印薮》雕版的失真,强调己谱的钤印本特征,通过抑人扬己达到宣传效果。从万历十七年张学礼《考古正文印薮》开始,其后各部集古类印谱凡例中几乎都能够见到类似“板用墨刷,印用朱砂”等凸显钤印本形态的用语,如《考古正文印薮》凡例云:

> 附各谱木刻诸印,不过百余方,或经工匠摩刻,文理断续,或木性干湿,字画欹斜,一一厘正。今所编者,尽铜石章,庶不改制……板用墨刷,印用朱砂,覆以二次,一皆明朗,不敢草率苟简,蹈其前辄,鉴者

①《古印选凡例》,陈钜昌:《古印选》卷首,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钤印本,叶二。

②陈钜昌:《古印选》卷一,浙江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钤印本,叶六。

③洪迈:《容斋四笔》卷八,《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第 705 页。

④例如程敏政记载,成化间扬州大运河浚河得古印多方,其中就有一方“寿亭侯印”(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八八《都宪张公淮上所获四印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53 册,第 703 页)。

⑤《集古印谱凡例》,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谱》卷首,国家图书馆藏顾氏芸阁明万历三年(1575)刻本(索书号:09787),叶二。

辨之。①

按照《考古正文印薮》凡例所言，张学礼对《印薮》中由刻工摹刻不善造成的“文理断续”者以及由于木刻造成的“字画欹斜”者，以铜、石重新摹刻，并且采用“印用朱砂，覆以二次”的制作方式成谱。其凡例内容又被其后多部印谱转引，如万历二十四年甘旸《集古印正》凡例云：

> 兹谱所集皆选择秦汉历朝旧印，官私共一千六伯有奇，托以金石，分为五卷，所释文字、钮制，寄之梨枣，印用朱砂，复以二次，板用墨刷，印于越楮，以广其传，好事者鉴之。②

万历三十五年潘云杰《集古印范》凡例云：

> 以朱砂手印作谱，宛然秦汉真迹，观者自能具眼。③

万历四十年释自彦《图书府印谱》凡例云：

> 印用朱砂，复以板，用墨刷，印于楮，以公鉴赏者。④

晚明印谱为扩大销量、博取利润，采用多重营销策略。无论是于谱名中嵌入“博纂”“正文”“正”“则”“范”等词，标榜所载印章宏富精审；于序跋中夸大其受欢迎程度，营造风行一时的景象；还是于凡例中采用抑人扬己之辞，以吸引潜在读者，凡此种种，无不揭示这一时期的印谱刊行与商业活动关系紧密。

（二）盗版与版权意识

印谱作为一种新兴“读物”，有大量潜在读者，市场需求也极为旺盛。成书较早的木刻本《印薮》由于发行量大，影响也最为深远，针对《印薮》的盗版翻刻层出不穷。如前文所述，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徐熥在《序甘旭印正》一文中即谓“武陵顾氏所刻《印薮》，搜罗殆尽，摹勒精工，稍存古人遗意。第流传既广，翻摹滋多，舍金石而用梨枣，其意徒以博钱刀耳”。陈毓的观察与徐熥类似，他在《虚白斋印厩小引》中也谈及晚明时期“吴下贾者用木板翻梓”顾氏印谱的情况⑤。崇祯年间，南京俞彦也观察到此

---

①《考古正文印薮凡例》，张学礼汇选：《考古正文印薮》卷首，叶二。

②《集古印谱凡例》，甘旸编：《集古印谱》卷首，叶二。

③《印范凡例》，潘云杰：《集古印范》卷首，叶一。

④《凡例》，释自彦：《图书府印谱》卷首，叶五。

⑤陈毓：《虚白斋印厩小引》，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荣宝斋出版社，2010 年，第 1011 页。

时盗版《印薮》的现象频出，所谓“翻刻盗名字者所在蜂起”①。在众多针对《印薮》的盗版翻刻中，最具典型者当属渊雅堂翻刻本。现存渊雅堂翻刻本《印薮》牌记中虽然题有“悉遵原篆”字样，但刻工雕刻水平低劣，文字孱弱，印蜕呆滞。一个极端的例子出现在卷一“将军印”中，所载“超武将军之印”白文印一方（见图 6②）。该印的雕刻极为草率，印周木板并未铲去。这一情况从渊雅堂翻刻本的早期印本到晚期印本都未改正，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③和首都图书馆藏本④为同一套书版所印，通过版框、文字残破程度来看，早稻田大学藏本是早期印刷本，首都图书馆藏本印刷较晚，边框、文字残损较重，但二本中“超武将军之印”四周均未雕刻完成⑤。刻工雕刻未竟，校阅者也未能校出即付印刷，多次印刷后仍未发现，各环节之疏漏均反映出该本是在急于射利的情况下快速刊行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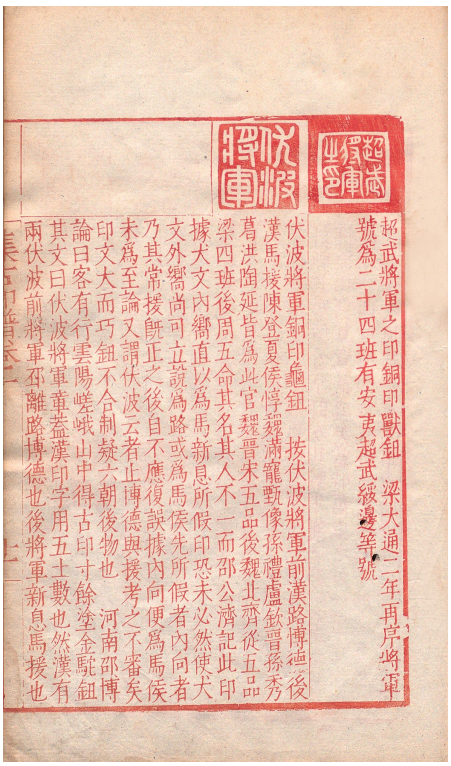

超武將軍之印銅印鼈鈕　梁大通二年再序將軍號爲二十四班有安夷超武綏遠等號
伏波將軍銅印龜鈕　按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馬援陳登夏侯惇羅瀟龐悆像孫禮盧欽晉孫秀暮洪陶延皆爲此官魏晉宋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梁四班後周五命其名其人不一而邵公濟記此印據犬文內嚮直以爲馬新息所假印恐未必然使犬文外嚮尚可立說爲路或爲馬侯先所假者內向者乃其常援既正之後自不應復誤據內向便爲馬侯未爲至論又謂伏波云者止博德與援考之不審矣印文大而巧鈕不合制疑六朝後物也　河南邵博論曰客有行雲陽嵯峨山中得古印寸餘塗金駝鈕其文曰伏波將軍蓋漢印字用五土數也然漢有兩伏波前將軍邳離路博德也後將軍新息馬援也

图 6　渊雅堂翻刻本《印薮》“超武将军之印”

①俞彦：《俞氏印薮序》，《俞氏爰园印薮》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十四年（1641）钤印本（索书号：05273），叶一。

②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薮》卷一，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明末渊雅堂刻本（索书号：306-0208），叶十一。

③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薮》卷一，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明末渊雅堂刻本（索书号：チ10 02818），叶十一。

④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薮》卷一，首都图书馆藏明末渊雅堂刻本（索书号：丙三13），叶十一。

⑤此外，同属渊雅堂刻本的《印薮》尚有香港松荫轩藏本（伊泽信实旧藏本），其中所载“超武将军之印”四周亦未雕镌完成，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早稻田大学藏本和首都图书馆藏本一致。

面对盗版现象，谱主很难规避，他们能采取的应对方法大致有两类。一是在印谱中增加“版权页”。“版权页”中多钤盖古玉玦一类图像用作正版的标记，以此提示购买者“慧眼辨之”。如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西泠印社、日本东京博物馆所藏《印薮》之扉页中皆印有朱印古玉玦，并标注“恐有赝本，用古玉玦印记”（见图 7①）。甘旸《集古印正》亦云“古玉夔龙为记”②。国家图书馆藏《宣和集古印史》亦采用类似的手法，在谱前加盖“汉佩双印”，并云“恐有赝本，用汉佩双印印记，慧眼辨之”③。

余藻《石鼓斋印鼎》的版权页较之上述诸谱更为复杂。该谱版权页仿顾氏《印薮》加盖古玉玦形式，改以古玉夔为识，并篆书题“古玉夔为识”字样（见图 8④）。此外，“文安余氏家藏”朱文印也应看作标记版权的组成部分。这些内容见于该谱的不同藏本中，如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



图 7　《印薮》牌记



图 8　《石鼓斋印鼎》牌记

①王常编，顾从德校：《集古印谱》卷首，西泠印社藏明万历三年（1575）顾氏芸阁刻本，牌记页。

②孙殿起录：《贩书偶记续编》卷十，第 153 页。

③来行学校摹：《宣和集古印史》卷首，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来氏宝印斋钤印本，牌记页。

④余藻：《石鼓斋印鼎》卷首，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崇祯元年（1628）钤印本（索书号：T/6416/8949），牌记页。

馆藏本、国家图书馆藏本等均一致。钤盖“古玉玦”“古玉夔”等做法能否起到防止盗版现象的发生,实在难以定论。

二是扩大印谱发行量,尽可能在短时间内最大程度地占据市场份额,以此挤压盗版的生存空间。崇祯年间俞彦在《俞氏印薮序》中曾雄心勃勃地称要将该谱“装潢万数”:

> 爰遵照顾氏原式作为此书,务还旧观,不复署目,第云《俞氏印薮》……余誓将装潢万数,以供海内好事者之求。①

“装潢万数”之说虽然夸大的成分居多,但也能看出俞彦力图抢占市场份额的决心。一部印谱要想快速抢占市场份额,必然会在短时间内大量发行,这在木刻本印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木刻本印谱在雕版完成后,不涉及钤印,它可以像一般书籍那样径直印刷成谱,这就使得木刻本印谱在短时间内大量发行成为可能,《印薮》各存本即充分揭示这一现象。现《印薮》存本中有多部为姚起原刻本的重修本,杜志强找到至少 7 部,其中最典型的是故宫博物院藏本,该本在姚起原刻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重修,替换了多块书版。据杜志强统计,该本序文部分除周伯温《印谱题辞》末叶外,重修了 13 版,正文部分也存在多处重修,其中卷一重修 22 版、卷二重修 22 版、卷三重修 9 版、卷四重修 3 版、卷五重修 1 版、卷六重修 13 版②。重修本的存在充分说明,《印薮》原书版经过大量印刷,已经出现瑕疵,非重修不能保证印刷质量。此外,杜志强另见湖南省图书馆所藏一部重修本,该本周伯温《印谱题辞》末叶也已重修,正文重修部分与故宫博物院藏重修本相同。这说明在印刷时间上,湖南省图书馆藏本较故宫博物院藏本更晚,在故宫博物院藏本印刷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来较为清晰的周伯温《印谱题辞》也已不再清晰,故而又对此叶进行重修。以上两部藏本中的重修书版已经超过《印薮》原刻本书版的三分之一,这种规模的重修说明此时《印薮》已经历过大规模印刷,以至于部分书版漶漫不清。短时期内的大量发行对迅速占有市场份额起到关键作用,对盗版的生存空间势必会造成挤压,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盗版的动力自然也会减弱。

---

①俞彦:《俞氏印薮序》,《俞氏爰园印薮》卷首,叶二至三。

②杜志强:《关于顾氏〈集古印谱〉和〈印薮〉版本的初步考察》,《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年,第 446 页。

结语

晚明印谱不仅是印学思想的传播载体与篆刻学习的实用范本，更是推动中国文人篆刻艺术走向自觉的关键力量。既往研究多视印谱为纯粹的艺术创作产物，强调其艺术价值，忽略其商品属性，无形中割裂了印谱与晚明商业出版的关系。

从“物”的角度上来说，晚明印谱可以被视为特殊类型的书籍，其制作、发行都与一般书籍相似。这意味着对晚明印谱的研究角度，不能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版本考订、书目整理与艺术风格分析等固有模式，还要将其置于16世纪以降的出版史大背景中加以审视。印谱刊行本质上是晚明商业出版体系中的经济行为，印谱制作过程中的资金筹措方式、定价机制、营销策略、盗版与应对手段等，共同构成印谱刊行活动的商业运作模式。正是这些要素的协同运作，保障了印谱的规模化生产，从而达到“尔时家至户到手一编”①，极大推动印谱从文人书斋雅玩走向公众阅读领域。对印谱商品属性的讨论，不仅不会削弱其艺术价值，反而能更清晰地揭示印谱对晚明篆刻艺术发展进程的影响。

本文写作得到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甘中流教授、赵宏教授指导；承蒙西泠印社社员杜志强先生、人民美术出版社刘亚刚先生、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古籍科曾纪刚先生见示印谱、家谱文献；《文献》匿名外审专家提出了宝贵而中肯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孙志强，华侨大学美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明清印谱文献。

①赵宧光：《金一甫印谱序》，金光先：《金一甫印选》卷首，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明万历四十年（1612）钤印本，叶三。